

角色与惯习

——“3·18反服贸运动”中的多元运动者

蔡一村^{1,2} 陈超^{1,3}

(1.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3.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2014年爆发的“3·18反服贸运动”在台湾造成了巨大的政治与社会效应。为能够有效区分活跃于运动中的多元运动者,本文提出了一个包含“运动角色”和“运动惯习”两个维度的分类框架。其中“运动角色”说明的是运动者在互动过程中的动态位置,“运动惯习”区分的是不同运动者长期形成并惯于使用的组织结构与话语策略。两个维度相结合,将台湾青年运动者划分为事件型发起者、事件型参与者、议题型发起者、议题型参与者四类。这一分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运动内部精微曲折的互动过程,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当前台湾社会运动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关键词: “3·18反服贸运动”; 多元; 运动角色; 运动惯习

中图分类号: D432.8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7)03-0006-11

DOI:10.14157/j.cnki.twrq.2017.03.002

引言

2014年3月18日晚,台湾“立法院”议场被近300名抗议者占领,“3·18反服贸运动”爆发。这场运动吸引了众多社会群体参与其中,青年运动者是其中能见度最高的群体。其中既有专为反对“服贸”而成立的“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也有在运动之前就已存在的“公民1985行动联盟”等社会运动组织,还有赶来声援的“g0v零时政府”“沃草”“新闻e论坛”“青年乐生联盟”等青年团体和校园异议社团。

可以观察到,议场内的运动核心决策圈为运动定下了“和理非非”^[1]的主旋律,在访谈中,一位被访者将议场外出现的“街头民主教室”、医疗通道、纠察巡视等展演称为运动者“规训化”的表现。^[2]然而,运动路线的分歧贯穿了运动的整个过程。这样的分歧既来源于对情境的不同反应,也受到运动者各自经验和惯习的影响。运动后期,部分运动者愤而出走,以另立山头的方式表达对运动走向的不满,在济南路自立“贱民解放区”,让参与运动的人民得到抗争的平台。^[3]

可见,这并不是一场精心策划、巧妙动员的社会运动,^[4]其中活跃着多元的参与者。那么,在这场运动中,应该如何区分多元的参与者? 本文将从“运动角色”与“运动惯习”两个维度出发,提出一个新的分类框架,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

作者简介: 蔡一村,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陈超,男,博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

一、“运动世代”与“运动诉求”——“3·18反服贸运动”运动者的类型划分

虽然少有专门的研究,但现有文献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划分“3·18反服贸运动”运动者类型的视角:“世代”与“诉求”。关注“世代”的研究者将发起这场运动的台湾青年世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关注“诉求”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运动中存在的多元诉求,并依据不同的诉求对运动者进行划分。

统计数据可以证实,台湾青年学生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人群。^[5]在王鸿志和刘伟伟、吴怡翔的研究中,台湾的大学生群体是运动的“先锋队”和组织者。^[6]钟厚涛认为,台湾激进青年在美国的煽动和民进党的操弄下导演了这场运动。^[7]一些研究者则从“世代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8]的视角出发,认为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与民进党的阶级政治论述,以及“野百合世代”学者运动经验与理论的传授,^[9]共同形塑了“野草莓世代”反权贵、追求普世价值、倡导世代正义、认同台湾主体意识的价值取向。^[10]这些共同的生命历程都显著提高了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意愿和能力。而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也为运动的动员提供了有利条件。^[11]凯琳娜认为,Facebook这类社交媒体提高了学运领袖传播运动信息的效率;^[12]信强、金九汎则补充,娴熟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动员者传播并培养了“反服贸”意识,构建了庞大的动员网络,扩大了舆论话语权,最终使运动得以开展。^[13]

关注“世代”的研究者将运动者视为持有同一身份认同的“身份共同体”(status groups)。同一世代的共同经历使他们形成了相似的“人生可用性”(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14]共享近似的政治观点。同时,青年学生也较少受到家庭与工作的羁绊,因此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但是,运动中不同团体对路线存在着不同的想象,^[15]后期部分运动者则分裂出去自立山头,说明“生命历程”(biography)^[16]的重叠并不意味着运动者天然的同质化。无论我们将团结在运动中的参与者视为一个集体,还是将其抽象为“具体的、具有一定特性的社会行动者”,^[17]都不仅忽视了这种团结内部的结构基础、参与者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更难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这场运动的发展过程。

因此,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运动参与者的多元化。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倾向于以运动中的诉求来对参与者进行划分。严安林指出,运动成功地动员了程序正义、反自由贸易、“反中”“反马”等各路势力一起“造反”。^[18]曾柏文概括了运动中的四种论述轴线和主要代表团体:“反中国因素”的“独”派、“反自由贸易”的左派、“反黑箱”的民主改革派,以及追求“世代正义”的青年学生。^[19]

无疑,对运动中多元诉求的关注增进了我们对运动者的认识。但以诉求为标准的分类,实际上是将其视为外生于运动的给定因素。然而,类似的诉求却不必然对应着固定不变的对象。运动者既可以是一个边追求“世代正义”边“反自由贸易”的左派,也可以是一个边“反黑箱”边“反中国因素”的“台独”学生。^[20]甚至还可以看到,“诉求”完全可以是被主动制造或自然产生的内生因素。比如,运动的核心分子并不排斥将统“独”议题作为运动能量的“燃料棒”,但他们仍旧将“反黑箱”作为运动的主要诉求;^[21]而运动中的意外事件也随时可能催生部分运动者产生新的诉求。因此,尽管以诉求作为维度来划分行动主体,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参与运动的动机与目标,却也无法避免诉求与参与者之间的“多对一”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依据“运动世代”将运动者视为一个整体,还是参考“运动诉求”对运动者的划分,都难以帮助我们清晰地理解这场运动中各方主体的多元性。这就需要提供一种新的分类的可能。本文从访谈和由二手文献中获得的经验资料出发,结合先行研究的成果,提出一个由“运动角色”和“运动惯习”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新的分类框架。

二、“运动角色”与“运动惯习”:一种新的分类框架

“运动角色”与“运动惯习”是理解运动者多元性的两个重要维度。前者指的是运动者在互动过

程中的动态位置,后者指的是不同运动者长期形成并惯于使用的组织结构与话语策略。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将“3·18反服贸运动”运动者划分为事件型发起者、议题型发起者、事件型参与者、议题型参与者四种类型。

(一) 运动角色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静态的结构分析,到对运动中动态过程的重视。从将社会运动看作是一种“病态的社会行为”的集体行为理论,^[22]到引入理性选择模型、强调运动参与者资源动员能力的资源动员论,^[23]再到将社会运动视为斗争性的政治过程,^[24]这些社会运动理论都只关注了运动的“某个侧面”。^[25]麦克亚当、塔罗与梯利将“时间”因素纳入考量,使社会运动研究视野转向了中观层次的“互动”。^[26]

受此启发,陈超、蔡一村提出了一个以“互动”为核心的运动分析框架,强调了参与运动的各互动主体间的合作、竞争、冲突等互动过程,根据与运动权力中心的距离远近,将各行动主体划分为被挑战者、挑战发起者与挑战参与者。^[27]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青年运动者在“3·18反服贸运动”的互动中所承担的“运动角色”,首先将运动者划分为发起者与参与者两类,二者都具有能动性和策略性,既具有选择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也能够根据情境选择因应策略。^[28]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运动的权力中心既可能转移,使发起者与参与者的身份互换,也可能分裂,使运动出现多个权力中心。

1. 发起者

本文将占据着运动权力中心的互动主体视为运动的“发起者”。一般而言,运动的发起者由少数积极分子构成,其中既包括了先于运动存在的组织,也有临时组建的松散联盟,还有积累了运动声望的“社运明星”。

发起者需要根据所处情境决定运动的抗争策略,并直接与被挑战者互动。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场运动的风格与走向。在面对突发情境时,他们也要为其决策承担更大的责任,甚至还有被迫退出运动的风险。在“3·18反服贸运动”中,短暂存在的第二权力中心“社科院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对议场外的情况更为了解,试图用一场新的占领行动树立威望,替换旧的权力中心。但行动的失败使他们失去了与原有的发起者竞争的资本,最终只得淡出运动。

2. 参与者

一场社会运动的形成与维系,除了少数发起者的运筹帷幄,还需要运动者能够凝聚成一定的“规模”(numbers)。^[29]本文将处在运动权力中心之外的互动主体划分为“参与者”。

参与者中既包括了未能进入权力中心、但全身心投入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包括没有放弃日常活动的普通参与者。参与者同样会根据情境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并非全然顺从发起者的指挥,并具有向发起者转化的潜质,可能与原发起者产生竞争。除了上文中试图进入运动权力中心的“社科院派”外,“贱民解放区”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具体的经验资料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进行讨论。

从“运动角色”出发,将挑战者划分为“发起”与“参与”两类,虽然有助于我们追踪挑战者内部的互动过程,但是,互动过程中的策略算计不能完全解释运动中参与者的分裂。这就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运动者,讨论挑战群体所固有的、外生于互动过程的多元属性。在这一点上,刘美好的观察正可以对此进行补充。她指出,近年来台湾青年社会运动形成了“议题导向”与“事件导向”两种抗争模式,^[30]不同模式下的运动者与运动组织在长期抗争中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结构与话语策略。本文将这一维度定义为“运动惯习”。

(二) 运动惯习

“惯习”(habitus)这一概念来自布迪厄的阶级理论。布迪厄将现代社会视为由不同“场域”(field)交叉渗透而形成的社会空间,^[31]惯习则是“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32]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秉性(disposition)系统,是“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33]布迪厄主要通过研究消费行为来展现其背后的惯习,^[34]在本文中,则通过考察运动者的运动

行为来展现其背后的运动惯习。“运动惯习”指的是在社会运动这一场域中,不同子场域的逻辑、规则与常规在各自运动者身上沉积形成的、持久而可转移的秉性系统,影响着运动者对社会运动的理解与行动方式的选择,并最终表现为运动者的“结构”与“话语”。其中,结构指的是运动者的组织结构,其中包括了运动组织的形式、组织与成员的关系,以及相应的运动动员形式;话语指的是运动者的意识形态、话语策略以及对台湾“文化资源库”(cultural repertoire)^[35]中不同运动“剧目”(repertoire)^[36]的偏好。

2000年后,台湾青年运动成为台湾“运动社会”(movement society)^[37]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产生了“议题导向”与“事件导向”两种抗争模式。不同的抗争经验逐渐沉积、内化形成不同运动者的“运动惯习”,构筑起了较坚韧的边界,并相对稳定地存在于运动者身上。由此,可将台湾青年运动者划分为“议题型”与“事件型”两类。

1. 议题型

议题导向型抗争往往因弱势群体在物质权利层面受到损害而爆发。这类以“自力救济”为典型的抗争大量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38]并在“解严”之后催生了众多高度机构化的社会运动团体。这些团体经过二十余年的壮大,发展出了独特的协力网络:依照各自关怀的议题,以结盟的方式(如台湾反核联盟等)来扩大抗争的力量。^[39]这样一个成熟的社运网络的存在,使2000年后才加入抗争的议题型运动者形成了“嵌入型”结构和“草根”话语。

所谓嵌入型组织结构,指的是加入某个议题的抗争的青年学生,在得到老牌社运团体的指导和接纳后,“嵌入”到既有社运联盟中,成为协力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既有可能直接加入社运团体,成为组织干部,也可能组建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团体,成为既有社会运动网络的一部分。^[40]同时,由于这类抗争时常陷入长期拖延的局面,为维持运动能量,运动者以深耕议题、融入在地为主要发展策略。长期共同抗争的经历在运动者之间、乃至运动者与弱势群体之间形成了强韧的情感纽带。议题型运动者对情感的重视虽然维系了组织的长期存在,但也使他们难以吸引到社运网络之外的民众的支持,只能通过内在动员结构进行动员。

草根话语指的是带有“去精英化”倾向的议题型运动者所选择的话语策略,其中包括了绝食、卧轨、上血书这类带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运动展演。他们对蓝绿两党都无好感,以草根自居,不禁粗口,敢于暴力对抗。但在极端压迫性的政治经济结构已逐渐改善的台湾,^[41]代表弱势群体发声的草根话语往往难以引起民众的共鸣。因此,更能够吸引媒体关注的“陈情”“喊冤”便成为这类抗争者所偏好的运动剧目。

在乐生院保留运动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嵌入式结构的形成与草根话语的运用。2004年,以医学院校学生为主的“乐青”成立,深入乐生疗养院,与台湾人权促进会(简称“台权会”)等团体一同为院民抗争,在国民党总部前绝食抗议,试图阻止捷运工程对疗养院的拆迁。长时间的扎根院区,使乐青深入了解了院民的想法,^[42]也在二者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院民甚至曾因担心绝食学生的健康声称要放弃抗争。正是这样的羁绊使乐青能够存续至今,不仅仍在为院民的安置与社区融入奔走呼吁,还成为各类“土地”和“人权”议题网络中的重要盟友。

乐青的出现,是政治转型后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意愿提升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以街头抗争的方式表达诉求。部分运动者创新了议题型运动者的结构与话语,成功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社会运动。这正是下一部分所要讨论的“事件型”运动者。

2. 事件型

事件导向型抗争产生于特定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凝聚出的强烈的集体情绪。因此,与议题型运动者所面临的“如何动员”的困境不同,事件型运动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及时有效地凝聚汹涌的情绪。为此,事件型运动者演化出了“模块化”结构与“精英”话语。

所谓模块化,指的是事件型运动者逐渐专业化,形成了三类不同功能的“模块”:动员模块、运营模块、技术模块,每一个模块下包括了数量不等的团体与个人。各模块间没有从属关系,通过人际关系

网络进行沟通协调。其中,动员模块处于关系网络的核心位置,一旦需要,就能够迅速号召其他模块“组装”到一起,形成一场社会运动;运动结束后就各自散去,等待下一次运动机会的到来。事件型运动者自成体系,由三类模块构成了一个不依托于原有社运网络的有机整体。

2008年之后,事件导向型抗争层出不穷,一批具有强大组织和号召能力的“社运明星”脱颖而出,构成了动员模块的主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组建临时的运动团体发起和维持抗争。运动过后,部分凝聚力较强的团体依然能够存在,于是就在下一场抗争中成为运营模块,负责运动的物资、纠察等日常运营。而构成技术模块的团体掌握着较强的专业技能,一般不参与运动的运营,而是为运动提供它们所擅长的技术支持。更开放的组织结构,使事件型运动者能够通过外在动员结构进行大规模动员。但工具化的取向使这类运动者间的关系并不稳固,一次策略上的分歧就可能致合作关系破裂。

精英话语指的是事件型运动者出于对“学生”身份的强烈认同,^[43]形成了迎合“台湾中产阶级对运动的想象”^[44]、具有精英化色彩的运动剧目偏好。因此,事件型运动者往往选择静坐、游行为主要运动展演方式,热衷于在具有强烈政治意涵的空间进行抗争,并在运动过程中刻意强调自身的精英属性,如在长时间静坐时安排人力将垃圾分类整理,在游行过程中呼吁维持地面清洁,不说脏话,不暴力抵抗警方清场等。

从“野草莓学运”和“白衫军运动”中,我们能够看到事件型运动者精英话语的形成。而运动者的模块化结构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中通过经验案例详细说明。发生在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是台湾第一个事件导向型抗争,数百名大学生在自由广场静坐,“理性、和平、非暴力”^[45]的运动剧目贯穿始终,为之后的事件导向型抗争定下了理性基调。^[46]而2013年的“白衫军运动”动员了10万民众参与,是“3·18反服贸运动”前台湾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运动现场秩序井然,游行过后地面整洁。这样以中产阶级精英自居的规训作风,也被“公民1985”带入“3·18反服贸运动”的纠察工作中。

在表1中,可以更清楚地区分议题型与事件型运动者之间的差异。这一维度的提出,目的在于引入一个影响运动参与者在运动中的行为和感受的因素:不同类型社会运动经验所形塑的运动者的“运动惯习”。这一因素既影响了他们在运动中对特定情境下成本-收益的解读,也促使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做出看似非理性的行为。但如果仅依据惯习对运动参与者进行划分,却也难免落入某种静态的“文本决定论”视角,^[47]忽视了运动发展的动态互动过程,因此,这一维度又需要与前文所述的“运动角色”维度相结合。

表1 议题型-事件型

	结构	内部纽带	动员方式	话语策略	剧目偏好
议题型运动者	嵌入型	情感与信念	内在动员	“悲怨恨干”	陈情喊冤
事件型运动者	模块化	人际关系	外在动员	“和理非非”	精英表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的社会运动是复杂的,理想化的议题导向型与事件导向型抗争十分少见,众多社会运动实际上同时吸引了两类运动者的共同参与。“3·18反服贸运动”就是其中重要且典型的案例。现实中的运动者也是复杂的,“议题-事件”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泾渭分明。议题型运动者不总是“悲怨恨干”,不会特意把抗议场地变得一片狼藉;事件型运动者也不总是“和理非非”,为了运动的发展同样也会选择暴力。他们都从台湾文化资源库中寻找抗争剧目,只不过从总体上看,二者的倾向与偏好有明显不同。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结合“运动角色”与“运动惯习”两个维度,来建构一个新的分类框架。其中,“运动角色”维度是从动态的角度来定位运动者在运动中的权力位置,帮助我们深入到运动的互动过程中去。而“运动惯习”维度是从静态的角度,强调运动组织与运动者长期形成的结构与话语的重要影响,将“惯习”作为区分行动主体的前置变量引入互动分析框架,增加这一框架的解释边界。根据这

两个维度,运动者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见表2)。

表2 台湾青年运动者的四个类型

		运动惯习	
		议题型	事件型
运动角色	发起者	议题型发起者	事件型发起者
	参与者	议题型参与者	事件型参与者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主要数据收集手段,并通过与新闻报道、视听材料、“立法院”公报、回忆录、先行研究等二手资料的互相印证,尽量保证数据的完整与准确。

本文作者曾于2010年前往台湾台北大学交换学习。该校众多学生积极参与了后来的“3·18反服贸运动”,社会学系甚至在运动期间停课。交换经历中结识的“种子”人脉为访谈的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使作者得以在此基础上以“滚雪球”(snow balling)的方式扩大受访者数量。为了增加受访者的代表性,每次访谈结束后,作者都请求受访者介绍不限定条件的潜在访谈对象。

主要访谈工作于2015年11-12月在台湾进行。期间,作者实地考察了台湾“立法院”“行政院”等曾爆发社会运动的地点,并参与2015年台北“秋斗”游行。由于部分运动者在“3·18反服贸运动”后赴大陆深造,因此访谈工作在离开台湾后仍在进行,直到2016年1月结束。主要受访者总计52人,其中参与半结构式访谈40人,进行日常访谈12人。为能够观察到受访者的情感流露与反应,访谈形式首选一对一面谈,在某些情况下则通过社交软件(如微信、WhatsApp、脸书Messenger等)进行。

在这些受访者中,既有“3·18反服贸运动”的参与者,也有持支持或反对态度的旁观者,还有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务人员。其中42.3%(22人)在“3·18反服贸运动”之前曾参与过社会运动,包括乐生保留运动、工人运动、“野草莓学运”“反媒体垄断运动”“白衫军运动”、反核运动等。从职业上来看,受访对象当中学生占55.8%(29人),这一比例与陈婉琪在运动期间进行的调查结果(学生占56%,554人)^[48]几乎一致;另外还包括了学者、政府公务员等各类人士。从年龄结构上来看,78.8%(41人)的受访者在20~40岁这一区间。

调查期间,台湾检察机关正在提告占领“立法院”的运动人士,因此,为提高双方的信任度,保证访谈内容的尽量真实,作者事先向受访者保证访谈内容和其个人信息的保密性,以手写记录代替录音,并隐去受访者姓名。在正式访谈中,作者通常不会直接进入主题,而是通过闲聊与受访者拉近关系,直到双方较为熟悉后,再遵循一定的问题提纲和顺序向受访者提出正式的访谈问题;期间尽量保持中立,并适当移情以了解受访者的立场,努力拉近与受访者的距离,以期获得更丰富真实的资料。如果被访者比较健谈,则给对方留下最大限度的自由叙述空间。最长的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从访谈的结果看,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比较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和体会,都能够对提纲上的问题进行回答。日常的非正式访谈则在正式访谈间隙不定时进行,有些在运动爆发时就已经开始。

为了获得尽量真实的数据,作者在访谈中运用“三角互证法”(triangulation),向不同受访者求证同一场景、同一个时段的事件,通过对照他们的回答,去伪存真,以尽可能接近事件的真相。^[49]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访者的叙述与基本事实之间能够呼应。

四、“3·18反服贸运动”中的四类运动者

这一节将根据上文所提出的分类框架,分别说明议题型发起者、事件型发起者、议题型参与者、事

件型参与者四类运动者在“3·18反服贸运动”中的表现和代表团体/个人。由于“运动角色”这一动态维度的存在,四类运动者并不总是同时存在,而是随着运动的进行而先后出现。

(一) 事件型发起者——核心决策圈

“3·18反服贸运动”中,由林飞帆等在校生在2013年8月召集成立的跨校青年社团“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是主要的青年挑战发起组织,与“反媒体巨兽联盟”成员陈为廷、“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一道,构成了运动的主要事件型发起者。其中,林飞帆从2008年“野草莓学运”开始参与社会运动,具有较强的组织和演说能力。陈为廷在高中时就参与苗栗“大埔圈地事件”等议题导向型抗争,身先士卒,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黄国昌往往以学者和智囊的身份参与社会运动,并曾多次在政论节目中出现,辩论风格犀利。他们从“反媒体垄断运动”开始合作抗争,就此成为台湾青年运动者中最突出的社运明星,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丰富的社运经验。

2013年3月17日下午,张庆忠宣布服贸协议“视为已经审查,送院会存查”。^[50]这一事件促使黄国昌、林飞帆等人策划了次日对“立法院”的冲击。但在一开始的筹备中,他们并没有考虑要长期占领议场,原计划是一次“快闪”行动:^[51]冲入议场表达抗议后,以不抵抗的方式被警方清场。3月18日晚,抗议学生成功占领议场后,林飞帆指挥一半占领者“躺在‘立院’中央,等着被(警察)抬走”。^[52]但当时场内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并非来自林、陈二人的人际网络,^[53]没有听从他们的指挥,抵挡住了警方的冲击,最终意外地成功占领议场。当警方重新组织人力时,议场外已聚集上千人,错过了清场的时机,使议场的“孤岛”状态得以维持到最后。

可以看到,以社运明星为主力的动员模块使运动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号召力,保证了占领行动的成功;尽管对“立法院”的“破窗而入”^[54]超过了一般事件型运动者行动的暴力程度,但他们很快就恢复到“和平理性”的运动剧目上来,并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互动的发生。

(二) 事件型参与者——模块化的辅助

部分参与者破坏了运动早期警方的攻坚,为占领的巩固争取了时间。冲入议场后,各路事件型运动者很快赶到现场,为运动提供支援。其中有的团体成员本就在占领现场,有的则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交媒体得到消息后赶到。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将介绍事件型运动者中的运营模块与技术模块发挥的作用。其中运营模块参与的互动,直接促使了部分参与者向发起者的转化。

首先,技术模块中的“台大新闻e论坛”和“g0v零时政府”分别为运动的新闻报道和技术支持做出了很大贡献。“台大新闻e论坛”由台湾大学一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组成,为外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了解运动过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弥补了主流媒体对运动报道的遗漏。他们致力于通过采访,“呈现在场参与者的想法,拼凑出一个较贴近事实、属于大众的这场运动的样貌”。^[55]而以“技术宅”^[56]为主的“g0v零时政府”则为运动的信息发布、场内网络联通与设备搭建提供了专业且迅速的支持,在一天之内架设起g0v.today的资讯汇聚网站,为运动内外的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十分便捷的平台。其次,在运营模块方面,曾发起“白衫军运动”的“公民1985”在运动初期负责青岛东路的纠察工作。该团体的理性作风在纠察过程中引发争议,他们用塑料绳划定通道,要求现场民众按照纠察指示进行移动,将运动变得“很像跑红白帖”,现场一片“温馨”。^[57]

动员模块发起运动后,运营模块和技术模块在第一时间为运动提供了急需的支援。不同专长的运动者处在共同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到现场后各司其职,减少了组织间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在短时间内完成组合,使初期的占领得以巩固和维持。

(三) 议题型发起者——运动的分支

由于路途较远,许多议题型运动者辛苦赶到现场后,^[58]却发现“游园会”^[59]般的运动氛围无法满足他们的运动意愿和热情。议场内外的区隔,也导致场内运动者无从了解场外情境。信息的不对等,以及对运动想象的区别,最终导致了议题型运动者对运动权力中心的竞争。

一支以台大公会、台大浊水溪社成员以及台湾清华大学社科所学生为主的议题型运动者在台大

社科院的运动后勤基地组建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成为运动的又一个发起者。后起的“社科院派”反感“议场派”的“自我规训”和高高在上,^[60]主张整合议场外的人力,强硬地扩大运动。但随着3月23日晚“行政院”占领行动的失败,“社科院派”迅速淡出,“议场派”顺势制度化了他们对运动的领导权。

流血的“行政院事件”使议题型运动者无法再通过竞争权力来改变运动路线,但他们仍然遵照自身的运动惯习行动。在参加了“3·30 凯道大游行”后,以“全关连”秘书长卢其宏等人为首的议题型运动者从议场内出走。他们不再顺从运动权力中心的指挥,但也不愿破坏这场运动,便在济南路西口的公厕旁成立“贱民解放区”。

“行政院事件”中,策略与惯习的影响可能同时存在,难以判断是哪一个因素决定了“社科院派”的行动。但运动后期“贱民解放区”的出走,却让我们比较明显地找到了惯习的影响。正是对运动路线而非运动本身的不认同,他们才选择了“弱者的武器”^[61]进行反抗。在这个不与事件型运动者合作的运动“飞地”中,他们讨论“服贸”对基层劳动者和小规模地方产业的冲击,和大资本进入后的土地征用与迫迁,表达和实践他们对运动的想象。^[62]

(四) 议题型参与者——沉默的付出

“3·18 反服贸运动”同时汇集了议题导向与事件导向两种特征。反对服务贸易谈判的背后,包括了“全球化”“自由贸易”“资本入台”“劳工剥削”“土地征用”等诸多议题,吸引了乐青等众多议题型运动者的关注。而3月17日张庆忠“30秒闯关”引起的轩然大波,则使“3·18 反服贸运动”转变为“野草莓模式”,成为由事件触发的抗争行动。^[63]

尽管运动从一开始就沿着事件导向型抗争的路线发展,但议题型运动者仍然作为参与者积极抗争,在“立法院”“行政院”两次占领行动中,都冲锋在前。运动惯习使议题型运动者并不认同“3·18 反服贸运动”的走向,认为“太过平和不是搞运动”。^[64]但由于议题型运动者的组织力量仅体现在单一议题中,跨议题组织间的沟通与协调并不顺畅,对运动的掌控力远不如分工明确的事件型运动者。这直接导致了“社科院派”在“行政院”占领行动中的失败,再也无力与发起者竞争。

“夺权”的失败使议题型运动者始终未能进入“3·18 反服贸运动”的权力中心。但对相关议题的关注,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甘心离开,而是以参与者的角色留在了运动中,默默地为运动提供支持,直到末期才集结于运动的“飞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通过对经验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四类行动者(见表3)的行为既出于即时情境下的策略算计,也受到外生于互动过程的运动惯习的影响。

表3 “3·18 反服贸运动”中的四类运动者(代表人物及团体)

		运动惯习	
		议题型	事件型
运动角色	发起者	“社科院派”: 黄守达(台大公会)、张之豪(台大浊水溪社)等; “贱民解放区”: 卢其宏(“全关连”秘书长)等	议场派: 林飞帆、黄国昌、陈为廷、“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
	参与者	青年乐生联盟、“基进侧翼”、捍卫苗栗青年联盟、各校异议社团等	公民1985行动联盟、台大新闻e论坛、沃草、g0v 零时政府等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结 语

“3·18 反服贸运动”造成了巨大而长久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是台湾青年社会运动中一个重要且典型的案例。在此次运动中活跃着多元的运动参与者,他们共同发起并维持了这场运动。本文尝试

为“3·18反服贸运动”运动者提供一种新的分类方式,以“运动角色”与“运动惯习”两个维度来区分运动者的多元性。

这两个维度的提出,为现有关于“3·18反服贸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补充,同时也有益于更系统、深刻地理解台湾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从“运动角色”维度出发,我们能够追踪这场运动权力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多元运动者围绕着权力中心进行了复杂的互动,不断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一步一步地将这场运动形塑为我们所观察到的形态。“运动惯习”维度的提出,则从文化层面增加了我们对台湾社会运动者的了解,补充了一个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的面向。可以发现,运动者在运动中并非全然受理性的驱动,他们既会进行策略算计,也会依赖在迥异的抗争脉络中长期积累形成的组织结构与话语策略,也就是运动惯习。在“3·18反服贸运动”这一案例中,嵌入式结构与草根话语承袭自台湾“解严”前后便已出现的“自力救济”运动传统;模块化结构与精英话语则产生于新生运动者对台湾社会中集体情绪的操控与利用。不同的运动惯习先于运动存在,影响着运动者在运动中的行为。

综上所述,两个维度的结合,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运动内部精微曲折的互动过程,也为我们某种程度上预测运动者在运动中的行为、乃至进一步认识当前台湾社会运动内在逻辑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分类框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运动的积极分子身上,对运动中占了相当比例的“社运素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议题型运动者往往通过内在动员结构进行动员,局限于相对较小范围内的动员比较难以获得大量社运素人的支持。但事件型运动者通过外在动员结构进行的大范围、无边界的动员努力,成功地吸引了众多社运素人参与到运动中。他们进入运动之后,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运动的互动过程?他们的行为是否也会呈现出某种特征?如果是的话,在本文的框架中处于什么位置?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对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 we 更进一步的思考,并在未来的研究中给予更多的关注。

注释:

- [1] “和理非非”指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
- [2] 见被访者 A2 访谈记录,访谈时间 2015 年 11 月 19 日。
- [3] [62] 《贱民解放区宣言》贱民解放区脸书,2014 年 4 月 1 日,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賤民解放區/賤民解放區宣言/691268437581421/>。
- [4] [27] 陈超、蔡一村《以“互动”为中心的社会运动演化分析——对中国台湾的个案观察》,《公共管理学报》2016 年第 4 期,第 114 页,第 116 页。
- [5] [48] 陈婉琪《太阳花学运静坐参与者的基本人口图像》,参见 One More Story 公民的声音团队《那时我在公民声音 318-410》,台北:无限出版,2014 年,第 233-240 页。
- [6] 具体论述参见王鸿志《台湾社会新动向与第三势力活动空间探析》,《台湾研究集刊》2015 年第 1 期,第 10-15 页;刘伟伟、吴怡翔《台湾青年与“太阳花学运”——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视角》,《台湾研究集刊》2016 年第 2 期,第 10-18 页。
- [7] 钟厚涛《浅析美国在台湾“反服贸运动”中的双重角色及其影响》,《现代台湾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14-21 页。
- [8] 世代政治指的是同一个“出生世代”的人们,在青年时期所经历的政治环境或社会事件,将导致他们共同经历政治社会化过程,并使这个群体在该时段内的政治信仰与行为模式(例如政党偏好)固化,即使随着该群体年龄增长也不会改变。参见 Braugart, Richard and Margaret Braugart. “Life-course and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s of Sociology*, 1986, Vol. 12: 205-231; Sears, David O., Nicholas Valentino. “Politics Matters: Political Events as Catalysts for Preadult Soci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7, 91(1): 45-65.
- [9] 何荣幸《学运世代:从野百合到太阳花》,台北:时报文化,2014 年,第 20 页。
- [10] 相关论述参见张顺《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的动向与影响》,《台湾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69-77 页;郑振清:《台湾新世代社会运动中的“认同政治”与“阶级政治”》,《台湾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9-15 页;黄皖毅《从“九合一”选举看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中国青年研究》2015 年第 10 期,第 78-87 页;吴宜《近年来台湾青年参

- 与社会运动深层原因探析》,《台湾研究》2015年第2期,第78-85页;李仕燕《民进党与台湾新世代互动模式评析》,《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3期,第14-21页。
- [11] 具体论述参见马锋《从台湾“反服贸学运”看网络的社会动员》,《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2期,第74-78页;陈文楠《浅谈PTT在太阳花学运中扮演的角色》,《公共知识分子》2014年第7期,第129-139页;吴裕胜《媒介生态学观点下的太阳花运动》,引自“中华民国”文化研究学会《文化研究年会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文化研究学会2015年。
- [12] 凯琳娜《社交媒体与太阳花学运》,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65页。
- [13] 信强、金九汎《新媒体在“太阳花学运”中的动员与支持作用》,《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6期,第16-24页。
- [14] McAdam, Doug,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6, Vol. 92(1): 64-90.
- [15] [53] [54] 见被访者S16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1日。
- [16] McAdam, Doug. *Freedom Sum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5.
- [17] 赵鼎新《哲学、历史和方法——我的回应》,《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第49页。
- [18] 严安林《台湾“太阳花学运”:性质根源及其影响探析》,《台海研究》2014年第2期,第3页。
- [19] [50] 曾柏文《太阳花运动:论述轴线的空间性》,《思想》(台湾)2014年第27期,第129-148页,第133页。
- [20] 例如被访者S7与S25,访谈时间分别为2015年11月22日、12月7日。
- [21] 具体论述参见赵刚《风雨台湾的未来:反思“太阳花运动”》,《文化纵横》2014年3期,第66-73页;曾柏文:《太阳花运动:论述轴线的空间性》,《思想》2014年第27期,第148页。
- [22] [25] [35] [47]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9页,第37页,第223页,第215页。
- [23] McCarthy, John and Mayer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Vol. 82(6): 1212-1241.
- [24] Tilly, Charles.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McAdam, Doug.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51.
- [26]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8] 朱立群、聂文娟《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兼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动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15-16页。
- [29] [36]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第4-5页。
- [30] [63] 刘美婷《一夜长大:台湾当代青年参与之滥觞》,《思想》(台湾)2014年第27期,第111-128页,第124页。
- [31] [34] 洪岩璧、赵延东《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77页,第80页。
- [32]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71-172页。
- [33] 菲利普·柯尔库夫著《新社会学》,钱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 [37] Tarrow, Sidney.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3-198.
- [38] 王甫昌《社会运动》,引自王振寰、瞿海源主编《社会学与台湾社会》,台北:无限出版,2003年,第422页。
- [39] 顾忠华《社会运动的“机构化”:兼论非营利组织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引自张茂桂、郑永年主编《两岸社会运动分析》,台北:自然主义,2003年,第15页。
- [40] 需要另外说明的是,台湾高校中的许多异议社团也有着悠久的抗争历史。例如,成立于1987年3月的台大浊水溪社是台湾第一个单一议题(台湾农业)的学生运动团体(参见邓丕云《八〇年代台湾学生运动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他们以在校生为主要成员,但本身也是既有社会运动网络的一部分。在本文中,同样将这类组织视为议题型运动者。
- [41] 何明修《导论:探索台湾的运动社会》,引自何明修、林秀幸主编《社会运动的年代:晚近二十年来台湾行动主义》,台北:群学出版,2011年,第26页。
- [42] 潘佩君《乐生疗养院院民面对搬迁政策的主体性研究》,台湾阳明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64页。
- [43] 何东洪《我的台北“野草莓”杂记》,《思想》(台湾)2009年第11期,第122页。
- [44] [46] 见被访者S25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15年12月7日。
- [45] 谢合胜《线上共识动员研究——以2008年野草莓学生运动为例》,铭传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42页。

- [49] McCall , George J. and Jerry Simmons.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Text and Reader*. Mass.: Addison-Wesley , 1969.
- [51] 晏山农、罗慧雯、梁秋虹、江昺仑《这不是太阳花学运: 318 运动全记录》,台北: 允晨文化 2015 年,第 33 页。
- [52] 谢硕元《十四天来的观察与心得》,谢硕元脸书贴文 2014 年 4 月 1 日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4170703041897&id=1713896120&match=5Y2B5ZubIOWkqSDkvobnmoQg6KeA5a%2BfLOilhyDlv4Plvpc5b%2BD5b6XLOS%2BhueahCzljYHlm5ss6KeA5a%2BfLOilhyzlpKk%3D。
- [55] 新闻 e 论坛《街头守门人——台大新闻 E 论坛反黑箱服贸运动报导纪实》,新北: 卫城出版 2014 年,第 38 页。
- [56] 见被访者 S15 访谈记录,访谈时间 2015 年 12 月 1 日。
- [57] 见被访者 S25 与 S21 访谈记录,访谈时间分别为 2015 年 12 月 7 日、12 月 3 日。
- [58] 作出这样判断的理由在于: 首先,运动发起者是在 3 月 18 日晚占领后才通过各自的人际网络进行动员。此时已是晚上 9 点之后,身处台北的学生才有时间与精力迅速参与到运动中;台北之外的被动员者,一般要 19 日白天才能到达现场。其次,台北是台湾的政治中心,事件导向型抗争往往都发生在这里,而议题导向型抗争的发生地则并不固定,散布于整个台湾。因此,首先到达现场的多为事件导向型参与者,而中南部的议题型运动者到达时议场已成孤岛。
- [59] 见被访者 O1 访谈记录,访谈时间 2015 年 11 月 22 日。
- [60] 见被访者 O2 访谈记录,访谈时间 2015 年 11 月 29 日。
- [61]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年。
- [64] 见被访者 S21 访谈记录,访谈时间 2015 年 12 月 3 日。

(责任编辑: 沈惠平)

Role and Habitus

——On the Various Participants of “3 · 18 Anti-CSSTA Movement”

Cai Yicun , Chen Chao

Abstract: On March 18 , 2014 , a few hundreds of students stormed the assembly hall of Taiwan ’ s “Legislative Yuan”. The 24-day occupation is later known as “3 · 18 Anti-CSSTA Move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ovel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of two dimensions: participants’ role and habitu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participants’ position i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of the movement while the later concern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ve habitually used. In terms of these two dimensions , the various participants in “3 · 18 Anti-CSSTA Move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the event-orientated initiators , event-orientated participants , issue-orientated initiators and the issue-orientated participants. The classification will , the writer believes , help u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subtle interaction process , and at the same time , make it possible for us to have a better knowledge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Key Words “3 · 18 Anti-CSSTA Movement” , variety , participant role , habitus